

中山大学与 现代中国学术

吴承学 主编

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

主 编 吴承学

副主编 李青果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吴承学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689-4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山大学—学术研究—文集 IV. ①G649.286.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4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

吴承学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689-4

2014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4

定价: 280.00 元

编辑说明

一、本书编选研究中山大学校史、学科与学人的文献，依次分为三辑。

二、本书编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分属不同时代，为尊重历史，除明显的文字错误外，一仍其旧。一些文章收入本书后，作者重新修订。

三、从图书、期刊辑录的文章，均在文末注明出处。个别文章题目有改动，一并在文末注明原题。未标出处者，为本书专稿。

四、中山大学建校将近一个世纪，传统深厚，名家辈出，史料丰富，因编者识力与本书篇幅所限，遗漏或不当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指教。

序

许宁生

吴承学教授惠示《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书稿，嘱我写序。该书洋洋百余万言，一时难以遍赏。然走马观花，也可大致领略其佳胜。

今年恰值中山大学建校 90 周年，全校师生、校友怀着欣喜之心，以各种方式迎接校庆。吴承学教授主编此书，是一份切题而有意义的献礼。校史研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以往有年谱、通史、散文随笔等，而此书另辟蹊径，以教育史与学术史为视角，广泛钩稽史料，收集深度研究中山大学校史、学科、学人的文献，以学理方式呈现中山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关系，我以为，这是一种颇有深度与特色的校史研究方式。

读了这部书稿，我有一些感想。中山大学建校 90 周年，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它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却是罕有其匹的。中山大学 1924 年由孙中山先生手创，始为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先生，遂于 1926 年更名国立中山大学。为实现中山先生“振兴教育”、“陶冶人才”、夯实“立国大本”的创校目的，几任校长如邹鲁、戴季陶、朱家骅、许崇清等勉力制定办学规划，完备学科建制，多方延揽优秀人才，使中山大学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办学规模一流、科研实力雄厚的著名高校。其时正值中华民族万方多难、亟须振衰起敝的时刻，但即使处于动荡环境，中大学人都不忘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旨趣，追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境界；“革命不忘读书”、“要以学问求人生”更成为他们为人、为学、贡献社会的坚定信念。他们坚信国家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科学的进步；大学的立校根本，始终在于学术。在学术处于新旧汰变、中西交通的路口，他们推陈出新、融会贯通，孜孜以求地致力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为中国新教育和新学术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读了这部书稿，有一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中山大学建校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一所雄居前列的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我以为除了政府高度重视、重点支持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这是一所崭新的、没有历史负累的大学，大学掌门人以及许多教授具有强烈的现代大学制度意识和国际性眼光。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之中，是非常突出的。中山大学自建校之日起，就以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为目标。1927 年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议决的《大学规程》规定,高校分设文、理、法、医、农、工、商、师范、美术、音乐等科,须有两科以上方得称为大学。中山大学在1927年就完成了文、理、法、医、农五科的建设;至1934年增设工科,中山大学终成为“有统系的整个的中山大学”。学科建制的系统完备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齐头并进,迎来了学校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语言历史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民俗学会、教育研究所、西南研究会、涵盖文法理农工医各科的中山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以及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现代史学派等学术共同体,都站在中国学术前沿,使中山大学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学术重镇。1952年院系调整,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其文、史、农、医和社会、经济研究等学科力量,充实并促进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向着多元纵深发展。这些重要史实,在本书中都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回顾中山大学精彩纷呈的历史,我们是有着深深感怀的,前人筚路蓝缕,我们后人应该追踪其后,发扬光大。

多年以来,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以为,大学的精神,主要是从一批大师、名师身上体现出来的。优秀学者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中山大学自创校以来就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举要而言,文科著名教授有陈寅恪、朱希祖、岑仲勉、朱谦之、罗香林、梁方仲、刘节、鲁迅、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赵元任、容庚、商承祚、冼玉清、王力、詹安泰、王季思、董每戡、梁宗岱、钟敬文、冯友兰、杨荣国、王亚南、陈序经、杨成志、梁钊韬等,理工农等科著名教授有姜立夫、黄际遇、张云、罗宗洛、邓植仪、丁颖、陈焕镛、蒲蛰龙、陈国达、朱物华、卢鹤绂、冯秉铨、高兆兰、乐森浚、孙云铸、罗雄才等,医科有号称“八大金刚”的一级教授梁伯强、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秦光煜、林树模、钟世藩、周寿恺,可谓“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当然,限于篇幅,本书所选只是中山大学名家的一部分。借斑窥豹,已足见中山大学的精神气韵。中山大学学者以坚毅刻苦、开阔怀抱和创新精神,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启疆拓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是高尚人格的风标和大学精神的孳乳之源。他们身上体现着为振兴中华而献身学术和教育,谨守科学精神的优秀品质,也表现出由积学、修身而散发出的丰富才情和大家风采。对他们而言,立言、立德、立功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我们既要继承他们的学术遗产,也要追慕他们的学人品格,和他们作深长隽永的心灵对话。

我注意到本书的编纂采用“详远略近”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对中山大学早期历史的研究收录比较多,对于晚近的研究则收录比较少,对于当下则没有涉及。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有其局限的。但我还是理解这种编纂方式,因为历史需要时间的积淀,也需要长

时段与有距离的观察。对于离我们太近的人与事,评价起来有时反而不易公允、准确。所以从积极方面看,“详远略近”的历史研究方式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既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中山大学的同仁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历史,传承历史,同时创造历史吧。

中山大学九十校庆前夕于康乐园

目 录

第一辑 校史研究

黄义祥	孙中山与中山大学	3
周兴樑	邹鲁与中大	21
杨鑫洁	戴季陶与中山大学	29
朱家骅	国立中山大学筹备之经过和将来之希望	37
戴季陶	中大的改进	45
邹 鲁	办理国立中山大学(上、下)	51
曹天忠	中山大学民族中心制教育与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教育	79
李兴韵	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转型:国立广东(中山)大学的 建立与变制	109
哈姆著	李承三译 国立中山大学川边调查团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 旅行纪略	138
温梁华	中山大学迁滇办学考	146
杨应康	中山大学在激江	155
黄义祥	中山大学在坪石	160
梅 海	活跃的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	165
桑 兵	1948 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72
黄 悦	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山大学的实践	186
鲁 阳	柯麟对中山大学医科发展的贡献	206
高冠天	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	215
余齐昭	李坚 钟荣光与岭南大学	225
张晓唯	陈序经最后二十年的浮沉	233

第二辑 学科研究

吴 康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扩充计划书	243
佚名	本校文史科概况	247
刘小云	现代中国学术的转承与分合: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 设置及取向(1926—1949)	250
陈以爱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学术旨趣	286
刘小云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学术转型	304
曹天忠	杨思机 国立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与中国现代史学 研究的“社会科学化”	315
王 传	民国时期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述评——以中山大学 文科研究所为中心	348
夏书章	中山大学法政学科百年回顾	356
周兴樑	胡 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开拓者——国立 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1927—1949)探析	363
周大鸣	吴 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378
梅方权	史禄国与中山大学人类学	398
施爱东	中山大学民俗出版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406
娄贵品	“西南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 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429
殷 开	购书与整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初期发展问题	433
程焕文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整理与保护	446
黄增章	民国时期中山大学文科刊物述要	459
王 传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西南研究	466
周 旂	岭南大学图书馆“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研究	482
张 云	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成立始末记	503
苗文绥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现况	511

萧冠英	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筹设之经过及对于高等工业教育之管见	516
司徒尚纪 许桂灵	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学术风格和社会贡献	525
李青果	中山大学地理学者的丹霞地貌研究	542
陈小卡	朱明范等 国外医学教育思想与中山大学医学教育模式的变迁	553
林枫林	李约瑟与中山大学的农史研究	560

第三辑 学人研究

李 瑛	邹鲁的服务乡村办学理念及其实践	567
张荣芳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	576
周文玖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587
张荣芳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598
王兴瑞	朱希祖先生与国立中山大学	610
赵立彬	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与全盘西化论	614
李伟江	鲁迅与中山大学	623
吴承学	彭玉平 论詹安泰在中国文学学术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646
黄天骥	董上德 董每戡先生与他的“剧史”研究	663
康保成	王季思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675
曾宪通	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	690
陈炜湛	谭步云 商承祚先生与甲骨学、简帛学	706
黄任潮	冼玉清教授传略	720
吴宏聪	王力先生与中山大学	732
李青果	梁宗岱和他的象征诗学	737
蔡鸿生	仰望陈寅恪	751
姜伯勤	岑仲勉先生学述	779
刘志伟	陈春声 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796

周文玖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 教研活动为中心	822
曾宪礼	刘节先生的治学成就和学术境界	832
李锦全	吴熙钊 杨荣国同志的治史方法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 ...	839
程美宝	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	847
蔡家麒	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记杨成志先生滇川调查之行	864
庄益群	梁钊韬与人类学	869
陈其人	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	879
吴大任	姜立夫先生和中国现代数学	897
溢 美	张云与现代天文学	906
W. J. Haas 著 许兆然译 陈焕镛和阿诺德树木园		910
何貽赞	邓植仪教授教育与学术思想研究	924
赵艳萍	倪根金 丁颖教授在稻作(种)起源问题上的探索及贡献	934
麦淑萍	生物环保第一人蒲蛰龙	943
熊 敏	董 郡等 鼻咽癌研究的开拓者梁伯强教授	954
孟俊非	许达生等 谢志光教授传略	963
卢春宁	我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陈耀真教授	971
李友松	许龙善等 陈心陶教授对并殖吸虫的研究	985
熊 敏	宗永生 著名病理学家秦光煜教授	991
姚愈忠	詹澄扬 生理学家林树模教授	998
沈皆平	钟世藩教授传略.....	1002
余斌杰	马 越 内科学家周寿恺教授.....	1005
后 记.....		1009

第一輯 校史研究

孙中山与中山大学

黄义祥

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是孙中山于1924年2月4日倡办的。孙中山对筹办工作高度重视,不仅以国立广东大学前身三校之一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扩大它的影响,且常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解决筹办和办学中的具体问题,使国立广东大学开办后即成为华南第一所由国人自己创办的多科性最高学府。孙中山逝世后,为永远纪念并继承、发扬孙中山的伟大革命精神,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成立的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17日正式明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

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办,是与孙中山毕生的奋斗目标相一致的。

孙中山于1923年3月重新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在广东政局十分混乱,亲自部署并指挥军事力量统一广东的繁忙日子里,还念念不忘发展高等教育,1923年11月27日,他以大元帅名义令将广东高等师范改为国立,并任命邹鲁兼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邹鲁为“专心教育”,呈请孙中山免去他所担任的广东省财政厅长职务,孙中山对此表示赞赏,准许他的请求。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孙中山鉴于历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和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深感建立革命军队和培养革命的理论科学文化建设人才的重要,于同年1月24日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以孙中山为总理,蒋介石为校长,是为黄埔军校。2月4日,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着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二是《委派邹鲁职务令》,“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①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434、590—591、452页。

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的思想,是和他一生的奋斗目标相一致的。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救中国和救中国人民。

为了具体解决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仿效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经验,深感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于是,他在改组国民党时就提出并亲自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在6月16日开学典礼那天亲自前往讲话,阐明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指出办这所学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强调“大凡建设一个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他希望大家要“立志做革命军”,并“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①孙中山也从多年革命经历中注意到从深层培养、造就革命的理论科学文化建设人才的重要。1923年8月15日,孙中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对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五次评议会演说时,多次提到学生应担当起革命的重任。他早已看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性,把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正是这个思想在行动上的具体反映。1923年12月21日,他在百忙中应岭南大学学生会之邀,前往岭南大学怀士堂(今中山大学小礼堂)作《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讲演,更把这个思想表述得一清二楚,他对比了美国人经营的这所大学,提出:“中国何以不能自己创办呢?”他计算,岭南大学仅有一千几百名学生,而广东“人数号称三千万,如果提十分之一,也有三百万青年,应该象诸位都有受这种教育的机会。”“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机会的。就今日情形看,他们不能受高等教育的,是没有平等的机会。”他在论述了青年受高等教育应机会平等的理由后,进而分析了革命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希望岭南大学学生把自己培养成为中国革命所需要的人才,担负起“救贫救弱的责任”,使中国“转弱为强,化贫为富”。他当场告诫岭南大学学生要“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指出:“因为国家的大事,不是一个人单独能够做成功的,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么,造就人才的好学校,不可只有一个岭南大学。广东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②可见在此讲演后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的思想是酝酿良久,早已胸中有数了的。

孙中山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创办国立广东大学,说明他重视人才的作用,重视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正如邹鲁在一项呈文中所说的,他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故国家设立大学,实振兴教育之总键,陶冶人才之巨炉。东西各国莫不注重大学,其在该本国无论已,即近来在吾国设立者,几无不接踵而起,所以不惜竞投

①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5—256、253、260、287、369、442—443、31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542页。

巨资,莫非为国家奠定基础。我大元帅有见及此,将本省高师、法大,农专三校合并,改为广东大学。”^①

孙中山为了在广东和全国创办更多的大学,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人才的需要,通过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积累办大学的经验。在筹办国立广东大学过程中,即陆续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的《大学条例》共8条,于1924年6月6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广东大学之宏观》一文中刊出,及后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同年8月13日公布《大学条例》令,作为办大学的一个规范。其第一条所规定的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研讨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与其后经讨论修改的《国立广东大学规程》第一章《宗旨》的规定基本一致,可见《国立广东大学规程》是以其为依据制定的。孙中山公布《大学条例》令,说明他对办大学以培养革命和建设所需人才的重视和紧迫感。

二

孙中山提出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的三间学校,分别创办于1905年(高师、法大)和1909年(农专),均有一定的办学基础和办学经验,但作为最高学府的多科性大学来创办,任务却是十分艰巨的。孙中山决定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并任命邹鲁为筹备主任后,亲自抓筹备工作的落实,解决办学的具体问题。

1924年2月9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第52号,令广东省长廖仲恺训令合并国立广东大学的三间学校,“嗣后所有用人、行政,悉由该筹备处主管办理,以归划一,而促进行”。同日训令邹鲁:“即将各该校接管,以速筹备成立具报。”^②

广东省长廖仲恺,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训令。1924年2月20日发布省长训令314号,令省教育厅,指出由于孙中山将三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筹备主任,所有用人行政,悉由筹备主任主管办理。但因“法科大学及农科专门学校,悉属省立性质,校长原为本署委任,现既合并改为国立大学,各该校校长,自应即予取消,以便筹备主任及时接管办理”。^③

同年2月21日,邹鲁遵令正式就任筹备主任职,着手进行接管三校的工作,并分别聘请学术界、教育界知名学者,已改组的国民党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要员、广东省政府要员及有关人士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马君武、孙科、许崇清、蒋梦麟、李大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434、590—591、452页。

③ 《省令取消两校长》,《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2日。

钊、石瑛、胡适、王星拱、王世杰、周览、皮宗石、郭秉文、吴敬恒、李石曾、易寅村、杨庶堪、陈树人、熊希龄、范源濂、顾孟余、任鸿隽、杨铨、胡敦复、黄昌谷、关恩助、程天固、徐甘棠、梁龙、何春帆、陈耀祖、邓植仪等 35 人为筹备员。同时,特别邀请几位著名学者,如王世杰、王星拱、石瑛、周览、皮宗石等,来校协助草拟计划规章。

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成立后,为使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先行制定有关筹备工作的规定,并于 1924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组织大纲十条,对筹备处机构设置、各机构职责、人员分工、筹备工作程序及有关会议制度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筹备工作开展后,孙中山针对当时广州“各军云集,杂居市尘,教练管理,诸多困难,亟应移驻郊外,以资整理,而立国至计,端肇树人,建设伊始,需才尤众,设立大学,需款正殷”的情况,特以大元帅名义训令广东省长杨庶堪,“于四月一日起,在该市征收租捐一月,以该款之半在市外建筑兵房,俾居军队,以其他半数,拨交国立广东大学,充开办设备两费”,并特别指示:“事关整军兴学,仰即迅速遵照办理。”^①筹备工作伊始,孙中山即注意筹集经费,这对国立广东大学及后的顺利开办,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第一次筹备会议后,根据筹备处大纲规定,每周开会一次,制订有关规章制度,有些议案及规则,邹鲁还邮寄未能到会的筹备员阅签。根据筹备处议决,三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后,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文科、理科,广东法科大学改为法科,广东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农科,另筹设工科及预科。对所设科、系、课程内容和设备,按规定成立各种特科委员会负责研究并拟订各该科的计划。据此,成立六个特科委员会:

(一)预科委员会。预科分文、法、理、农、工五科办理。其组成人员及预科主任,均由大学各本科教授担任,以利于预科与本科衔接,并节约用人经费及提高办事效率。

(二)文科委员会。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哲学四个学系。学生由原国立广东高师文史部、英文部学生转入肄业。

(三)法科委员会。设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学生由原广东法科大学学生转入肄业。

(四)理科委员会。分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五个学系。学生由原国立广东高师数理化部及博物部学生转入肄业。

(五)农科委员会。分设农学和林学两大部。学生由原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学生转入肄业。

^① 《建筑兵房与筹办大学》,《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3 月 20-日。